

近代文学观与科学传播

——谈任鸿隽科学救国的文学理念

耿 嫻^{1*} 田列朋²

(中国科学技术馆, 北京 100012)¹

(北京语言大学, 北京 100083)²

[摘要] 章太炎的古文经学以传统“小学”为基础, 建立“以文字为准”的文学思想, 强化文字表意和致用的功能, 通过调用中西学术博大的论证论据达到缜密说理的效果。任鸿隽早年深受章太炎古文经学的启发, 在科学救国的道路上始终坚守国文立场, 并坚称科学文章亦是文学, 力求用科学化的文学观重铸国人人生观。同时, 他从“义理、考据、词章”三个维度审视科学化文学观应有的姿态, 给国文确立了崇实贵确的品质。任鸿隽的“文学观”是中国学术走向全盘西化的征兆。他的存在体现了文学与现代学术分离、文人与现代学者独立发展的轨迹。

[关键词] 古文经学 科学化文学观 新文化运动 文学革命 自然科学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9293/j.cnki.1673-8357.2019.02.012

鲁迅曾经评价章太炎为“有学问的革命家”^[1], 一语道出章太炎从事革命和治学的双重身份和成就。章太炎于1906年在“苏报案”发之后东渡日本, 接受同盟会总部的倡议, 出任《民报》主编, 其间受留日学生的强烈要求开办国学课堂, 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均拜倒在他门下, 日后成长为语言学家、文学家, 直接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中, 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其实, 还有一位弟子并没有进入新文化运动恢弘的历史书写中, 却实实在在地通过另一种“文学”道路为新文化运动直接引入“德先生”和“赛先生”。他与揭竿而起振臂一呼“文学革命”的胡适是亲密的朋友, 参与胡适和梅光迪文言白话的论辩, 极

力反对“作诗如作文”的主张, 用胡适的话说最终“逼上梁山”, 只好孤注一掷将《文学改良刍议》寄给《新青年》, 得到更为激进的陈独秀支持。这一笔历史过往尚没有让他留下过多痕迹, 何况他提出大文学观, 将科学文章纳入文学革命的谱系中去, 这一文学见地能够纳入文学史研究。这位被忽略掉的文人就是任鸿隽。由于当今学科界限分明的缘故, 影响了我们对整个现代文学革命生态的掌握和了解。我们所熟知的任鸿隽, 是《科学》杂志的创办人之一, 中国科学社第一任社长, 还拥有中国自然科学教育家、化学工业科学家、四川大学校长等诸多身份。拥有这些学术身份之前, 他是一位追随章太炎有

收稿日期: 2018-07-19

* 通信作者: E-mail: gengxian010@sina.com。

着排满革命思想的同盟会革命党人。不但参与革命暗杀活动，同时还撰写发表引起社会轰动的革命文章。并在辛亥革命成功后担任临时政府总统秘书要职。因而从政治救国转为科学救国这两个阶段来看，用“有学问的革命家”形容他也不为过，可谓步了老师章太炎的后尘。

从传统到五四，文以载道、“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姿态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所改变的只是“道”的时代内容^{[2][6]}①。现代白话文提倡文学要承载现代人的世界观，于是就有了以周作人、沈雁冰为代表的“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和以郭沫若、郁达夫为代表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文学观念既要表达直面人生和社会的勇气，又要能承载现代人的苦闷和压抑，表达个体的生命体验和追索。但其实还有一派文学观点，在新文学宇宙爆发之际，与上两者文学观念一起诞生，但是却与新文学史擦肩而过，完全没有被历史记录在案。这批文人从小受国学浸染颇深，成年后沐浴欧风美雨，因为走上了自然科学研究之路，科学成为他们改造世界的武器。虽然文学离他们渐远，但天然的文学母文化给了他们理解科学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方式。



图1 任鸿隽（1886—1961年）

他们应用科学观念回看文学，然后用科学化了的文学观念对国人思想批判。于是就诞生了本土化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用任鸿隽夫人陈衡哲的话来证明，“那时（1914年）在留学界

中，正激荡着两件文化革新的运动。其一，是白话文学运动，提倡人是胡适之先生；其二，是科学救国运动，提倡人便是任叔永先生。”^[3]

任鸿隽试图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引入中文表



图2 陈衡哲与任鸿隽

达，将国文打造成能够与世界学术交流接轨的语言，即一套能够表述自然科学的汉语系统，这样的汉语系统因为富有理性能力可以承载自然哲学，形成新的价值观和审美体系。任鸿隽认为这才是新的文学。用他的话说，“文学主情、科学主理”，近代文学必须改头换面，能容纳和表达科学，才能以理智的情感打动人，教育和指导人生。这显然是中国传统的“主知”派古文观念在作祟。然而当时新文学在西方现代审美规定性的强烈影响下，章太炎所代表的这一派文学观终于成为文学史之外的文化存在至今。任鸿隽的文学观甚至被淹没，取而代之的成为了科学史研究范畴。正视任鸿隽的“文学观”，分析近代文人的文化潜意识，才能全面考察新文化运动的全貌，了解文学革命的多重姿态，以及文人向学者转化、文学与现代学术彻底分轨的历史过程。

1 从对章太炎亦步亦趋直至超越：古文经学是任鸿隽至关重要的学术背景

1.1 任鸿隽的中学时代：“合中西之言”的《脍书》打开任鸿隽的革命和学术视野

任鸿隽从小在晚清复杂的思想环境中成

①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说，“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抛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它仍然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

长。无论是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在促进西方思想传播、达成文以致用、开启行动和思想革命闸门上发挥着共同的作用。任鸿隽出生在1886年，6岁进家馆学习四书五经打下很好的旧学功底。8岁时赶上多事之秋。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遭失败。维新运动之后，梁启超的“新文体”逐渐成为科举取士的流行文体，“做惯八股文的读书人骤然失去依傍，梁启超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便成为应试考者的枕中之秘”^[4]。18岁时，任鸿隽以优异的传统策论文章考取秀才之名，于1904年“未废科举前最末一次考试”“以第三名”^[5]被取为府学生。新式学堂的教育以维新思想为内容。如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严复《群己权界说》，同时也有越封杀越流传的梁启超《新民丛报》，都激荡着年轻的任秀才之心，诱使他走上改良之路。“有人翻印梁任公之《灭国新法论》，读之尤令吾感动。”《灭国新法论》旨在宣传新民思想，呼吁效仿西方政治文化制度，在古老的中国掀起一场革命。慷慨的言论让年轻气盛的任鸿隽看来“渐不以校课为满足，而时时作改革运动。”学校面对这样不够安分守己的学生自然欲除之而后快，责令他转到短期师范班，一年半之后于1905年毕业。在这短暂的一年多学习中，维新派的今文经学煽动起了他的行动，而思想革命的种子则由古文经学播种。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馗书》进入他的视野。“答康书是以魏晋人的吐属，讲排满革命的道理，真是淋漓痛快，得未曾有。”“议论精辟，辞语尔雅，在当时谈革命的文字中可谓独树一帜。”“《馗书》则是他讲学的论著，文字艰深古奥，甚为难读。”尽管如此，“在一个暑假中仍把此书点读一过。从此对于太炎先生的思想文笔我是五体投地地佩服的。”^[6]

《馗书》是章太炎的早期著作，也是章太炎第一部论学的综合型著作。这部书在章太炎的生涯中多次修订，体现了他不同时期的学术思想。这部书于1900年4月刊行，由梁启超题写书名。这是章太炎思想与保皇派立场一致时期的集大成之作。然而之后章太炎与康梁思想决裂，走向排满革命。1902年重订《馗书》，1903年春《馗书》重订本脱稿，书名由革命党人邹容题写。任鸿隽称自己1904年读到了《馗书》，就是这重订之后的第二版，“记得《馗书》初版（实则第二版）的书面是《革命军》的作者川人邹容署签……”^[6]这一版里收录的《客帝匡谬》《分镇匡谬》，是对过去保皇思想的纠正，“可见先生曾有一时期赞同保皇党的保满主张，而提出了‘客帝’这个新名词，但后来把这个主张改变了。”据任鸿隽说对章太炎的“思想文笔”佩服，不过是对用训诂、考据、义理的古文经学文章方法陈述革命思想感到耳目一新。从1897年章太炎在《经世报》发表《变法箴言》就提出“民不知变，而欲速其变，必合中西之言以喻之。”^[7]这“合中西之言”的代表作就是《馗书》^{[8]219-220②}。这部书是他



图3《馗书》章太炎著 邹容题书名

②章太炎大量吸收中外优秀的学术思想，“1903年他删革重订《馗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引述了大量西方近代人类学、社会学、哲学、文学、语言学论著，甚至直接用作自己理论的依据。”



图4 章太炎(1869—1936年)

“儒学思想生成的初步”“取消作为传统文化支柱的儒学的神圣性，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人的意义和秩序世界，孕育着走向全盘西化的可能。”^[9]章太炎

从义理方面阐发诸子思想精髓，补正儒学的不足，突破了儒学唯我独尊的地位，较康梁维新派托古改制来说将学术朝着近代方向推进一步。特别是将西方自然科学和西方哲学引入，“使他的宇宙论和认识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过西学来补足的国学，迈出致用和求真的一步。国学具备求真和致用的能力之后，伴随着西方内容的大量输入，中国文化走向全盘西化自然就有了可能。章太炎一个抛砖引玉的动作，给了任莫大的文化力量和资源，给日后任鸿隽开启全盘西化文化之路打下一个思想基础。

从接触《尴书》开始，章太炎成为任鸿隽的精神偶像。偶像的力量到任1905年进入中国公学之后得到了倍增。中国公学——一所留日学生创办的学校——弥漫着强烈的排满革命情绪。“其（教育）程度仅为中等，而政治改革空气却极浓厚。余乐其与己见相合，故即居之。”^[5]于是“剪发易装，虽由此冒革命党之嫌疑，不顾也。”任读书期间恰逢章太炎“于出狱后赴东京前，曾来公学洗过澡”，更坐实了“中国公学被认为革命党的大本营，并非无故”^[10]，并且能与章太炎这位革命偶像擦肩而过，在任的笔触间流露出颇为自豪的语气。这种激励给任鸿隽留下诸多诱惑，为今后的师生之缘埋下伏笔。追随革命者脚步，奔赴日本留学，就成了任

鸿隽的不二之选。

1.2 任鸿隽留日时期：参加章太炎举办的“国学讲习会”，全面学习章太炎古文经学，并效仿章太炎走上以文革命的政治道路

1908年任鸿隽到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任四川分会会长。有感于革命党暗杀活动必须以炸药为武器，于是决计学习应用化学。“一切为革命二字所支配”^[5]。而此时，正值章太炎主持《民报》期间讲授国学。任鸿隽意外地得到了近距离跟随章太炎系统学习国学的机会，“于形声训诂及诸子源流之学略窥涯涘，顾亦可谓意外之收获也已。”用任鸿隽的话说，1908—1911在日本求学的三年，“自己认为值得的，恐怕是从章太炎先生读了几年国学”^[10]。

章太炎在日本期间讲授国学影响颇大。许寿裳记录“地址就在先生的寓所——牛込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我们同班听讲的，是朱蓬仙，龚未生，钱玄同，朱逖先、周豫才（树人，即鲁迅），周起孟（作人），钱均夫，和我共八人”^[11]，这一班八个人中并没有任鸿隽，因为鲁迅“怕大班太杂沓”^[12]，请章太炎专门给这八个人单开了小班讲授。任鸿隽是大班学员。所谓大班，就是一班热心国学的留学生邀请章太炎讲国学，“在东京神田区大成中学借了一个讲堂”，“每一周一次，大约继续了一二年”^[6]。讲习的内容包括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郝懿行的《尔雅义疏》，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等小学著作，包括《庄子》在内的诸子学，以及系统的中国文学史。章太炎讲座的内容后来被他整理成为《文史》《新方言》《岭外方音集》《庄子解故》《国故论衡》。

苏报案之后居于日本的这一时期是章太炎治学的黄金时期。在日本期间的章太炎在学术上完成了以小学为根柢，用唯识宗来梳

理诸子学，将儒学的权威降低，以学术的观点和致用的目的，综合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达到思想革命的目的。对比康梁三统改制主张变法来说，章太炎国学研究所显露出的民族主义思想更符合激进的时代要求。而这种讲学更“主精深谨严”，是章太炎的治学所独具的。

李泽厚评价章太炎“很明显是担任了一个思想家、宣传家的角色。”“他主要是凭一支笔进行斗争，在思想领域内起了重要作用。”^{[2]389}这种谨严的治学，充满着革命的情绪令任鸿隽颇为心仪。用笔战斗点燃了任鸿隽革命的智慧。首先，他仿照章太炎从古文经学出发，调用典籍、历史资源，用强大的论据论证陈述反满思想，“当时颇觉得于如何去学习中国文字已有把握，也曾努力做过几篇文章”，在四川保路运动时期，撰写的《川人告哀文》发表，引发舆论强烈反响^{[10]③}。他的革命能力得到孙中山赏识，一度成为辛亥革命胜利后临时总统府秘书，起草政治文章。袁世凯窃国之后，任鸿隽主动请辞赴美留学，竟遭到政府的挽留。利用古文经学从事革命斗争的活动完全是任对章的效仿。而他赴美留学，开办《科学》杂志，成立中国科学社，全力以赴思想救国，则更是得益于章的精神指引。这一阶段，密切跟随章太炎学习古文经学给他早年的科学救国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3 任鸿隽留美时期：建立科学化文学观，开启科学救国的历程

任鸿隽早年追随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的脚步，故而能将“义理、考据、词章”的治学方法融汇在对自然科学思想的传播和考察

之中。因而他一进入美国，就有觉悟超越一个学科一种知识的界限，将科学知识、科学文化、科学思想通盘考虑，引入中文，这就是他1914年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倡言建立“学界”的主要目的。其胸怀较其他留学生要博大和宽广。这是他后来之所以能担当《科学》杂志精神领袖所具有的高度。正如夫人陈衡哲记录任鸿隽所说的话：“‘所谓科学者，非指一化学一物理学或一生物学，而为西方近三百年来用归纳方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总和……同时，欲效法西方而撷取其精华，莫如绍介整个科学’。”^[3]任鸿隽曾评价章太炎是“通人”^{[6]④}，即学者和文人的特点兼而有之，因此“通人”的理想成为任一生致力的目标。因而他在20世纪初坚持用古文妙笔谱写科学思想，并将之视作文学。而且身体力行这一文学观，鼓励文学走上理性的道路。正因此，他与好友胡适进行白话文辩论时，认定“绩学”而非语言形式才是文学革命的要义。文学内容远比“文从字顺”的形式革命更有意义。文人学者化才是彻底实现文学革命的根本之道。

今天看来，科学化文学观是一种非常机械的文学观念，却是近代文章学向现代文章学迈进的重要一环。自康梁今文经学利用夹杂中西词汇半文半白的“新文体”和气势滂沱的语言气势征服读者心灵，到章太炎古文经学从字源训诂入手，以大量中国经史、西方思想严密论证、到任鸿隽进一步强化用自然科学改观文学，走出一条科学化的文学之路，这一条发展脉络既可以印证西学东渐日渐加深直至全盘西化的过程，也可看出近代

③据任鸿隽介绍，他参与四川保路运动，“做了一篇《川人告哀文》登在上海的《民立报》上，当时日本新闻界颇注意中国的言论，《川人告哀文》登出后，《朝日新闻》的上海访员曾打电到日本，说有这样一篇慷慨激昂的文章出现。我又曾受东京同学会的嘱托，做了一篇《为铁道国有告国人书》，也是一篇激烈的文字。”

④参见任鸿隽《记章太炎先生》中说，“当先生讲中国文学史时，有一天我们见先生的门首列了一个小榜，把中国古来的文人分为几类：第一是通人，如东汉的王仲任、仲长统，隋的王通，宋的司马光，属于此类；……我们当时窃窃私议，以为先生是属于第一类的。”

文人向现代学者迈进的历史步骤。研究此可以发现文学和学术脱离、近代文人和现代学者身份分离的轨迹。

但是，任鸿隽潜意识下的文学情感，无意识地充当了学术全盘西化的媒介策略。西学东渐以来，愈加追求功利实用的文学也最终一步步脱离中国文章学的范畴，成为现代学术论说文的雏形。而当时，新文学正加急



图5 中国科学社第一届董事会合影(1915年10月25日，康奈尔大学)(前排：赵元任、周仁，后排：秉志、任鸿隽、胡明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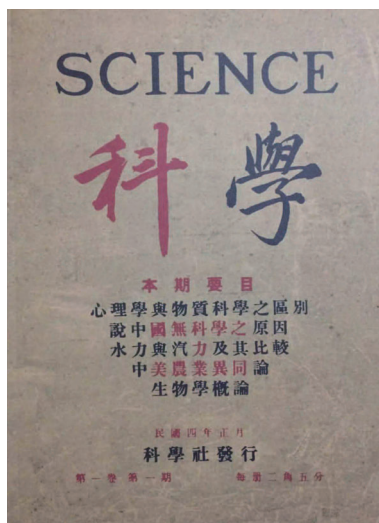


图6 《科学》创刊号，1915年出版

跃进，在西方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思潮中朝着独立审美特质的方向发展。现代文学和现代学术最终脱离传统意义上中国“文学”的共同源头而各自发展。

学工业。一面求学，一面思考如何将自然科学引入并改造国文。国文不仅是而且必须是媒介语言，才能传播科学文化深入国民心灵。因而他在1914年《留美学生季刊》上发表的《建立学界论》中提出，“于忠于所学之外，尚有一不可不备之要素焉，则其人必兼通国学是也。”“留学之职，在于贩彼所有，济我所无，负贩之道，在利交通，国学文字，所以为沟通彼此之工具也。”^[13]用国学文字来沟通中西学术，明显是吸收了章太炎的国学思想。

章太炎在日本讲学期间，发表在《民报》上的《国学讲习会序》中清晰地表达了国学作为媒介的观点：“精通国学，能合各种之关键而钩联之，直抉其受蔽之隐害，层层剔抉，而易之以昌明博大之学说，使之有所据，而进之以绵密精微之理想，使之有所用。”^[14]章太炎试图恢复古文经学的传统，从训诂字源做起，改变朴学苛求一字一词的考证，和“往继绝学”的保守态度，恢复文字的表意功能，用东西方哲学相互烛照，到达沟通文明致用之道。章太炎这一观念直接被任鸿隽在《建立学界论》(1914发表于《留美学生季刊》)中继承。

确立文字作为表意工具，在20世纪初期有极大的文化意义。文字被视为落伍的表意符号，被激进的文化人士提倡用拉丁文来取代。甚至还出现了以吴稚晖为代表的直接采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取代国文的主张。这种在西学面前不够自信的表现反而在当时成为标新立异和顺应历史进化的举动，得到了拥戴和认可，然而却遭到了章太炎的极端反感和否定。章太炎认为文字不仅能实现音形义合一，而且可避免拉丁语发展中意义发生变化而无法解读典籍的现象，且在方言众多的中国，文字最大程度地保持了文化的稳定和交流的畅通。因此任鸿隽在章太炎的这一观点上继续阐发，“今以吾国土地之广也，

2 任鸿隽科学化文学观的实践

2.1 任鸿隽坚守“文载科学”的理念，确立文学是科学传播的媒介工具

1912年任鸿隽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化

人民之众也，待举之事之繁也，……夫留学者一人……欲以其学传播于数十百人，非其国文能著书立说”，否则“夫外国学者虽众，不能有益于中夏学界。”

那么致力于科学传播的人就必须将文学能力放在首位。任鸿隽在《建立学界再论》中更进一步阐发了文学作为科学载体的重要性。“欲具传达学问思想之能，不可不通本国文学。”^[15]文学的教育功能被有意地强化。“文学者，如大匠之有刀锯准绳。可以为斫木垛石建筑室家之用。而非所以建筑之物也。建筑之物。是在求真与致用之学。”这里的求真和致用之学指的是具体的自然科学知识。文学是建筑之物“科学”的组织手段，不通文学，就不能很好地组织科学语言进行表达，也就不能够传达学问思想。传达学问思想只有依靠文学。只有这样才能“阐明求学之方法，陈大道于国人之前。”

然而就教育而言，任鸿隽确立了文学和科学可以相互取长补短的策略。任鸿隽在《科学与教育》一文中肯定了文学的教育功能。“导行审美之事，唯文学能之，故文学与科学之于教育，乃并行而不可偏废。”^[16]但是他又提出科学需要提升文学的教育功能，实现育人的最大效益。他得出结论“是故今日于教育上言文学，亦当灌以新智识，入以新理想，令文学为今人之注释，而不徒为古人之象胥，而后于教育上乃有价值可言”。那么这样，科学也可以导向审美，帮助人形成真和善的人生观。于是他提出一个大胆的论点，有着教育意义的科学文章也是文学的范畴。“文学者，又统泛之名词也。泛言之，凡事理之笔之于书者皆得谓之文学。故论辨、辞赋、

小说、戏曲之属文学也，而历史、哲学、科学记载之作亦文学。”对文学的见解可谓与其师章太炎有着精神上的高度一致。章太炎在《文学总略》中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言文。”章太炎建立了“以文字为准”的文学观^{[8]35}，摒弃了片面苛求文学审美功能的释放，突出了文学的实用性。《文学总略》是章太炎在日本“国学讲习会”上以《论文学》为题所做演讲的记录，收入《国学讲习会略说》。章太炎“强调“文”的最主要的功能都在于为社会生活基本信息的传输沟通、上传下达、左疏右通服务，在于承载历史、人生的经验，阐发现实世界的智慧。”^{[8]46}并且任鸿隽成功借用章太炎“齐雅俗”的观点，将小说、戏曲与传统文学、史学、经学并列，并又向前推进一步，将科学记载归为文学范畴，强化了文学的社会功能。

科学作为新的“道”成为文学的内容。任鸿隽的文学观是中国传统文章学意义上的文学。中国传统文章学不单单是指文章的写作、批评为核心的相关问题的系统理论，又往往在着力凸显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技”两者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特性^{[17]⑤}。因而经、史、子都成为文章学所研究和讨论的对象，并且是历代文人撰文所要参照和模仿的对象。章太炎侧重“名理之文”，以“魏晋之文，大体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已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庞达，可以为百世师矣”^[18]，因魏晋学者有雄厚的学力，故能后世学者须“效魏、晋之持论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学”。章太炎推崇魏晋之文，强调

⑤参见吴承学在《中国文章学成立与古文之学的兴起》一文中说广义的中国文章学成立标志是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狭义的标志是南宋陈骙《文则》。从文章学成立于宋代的立场来看，《文心雕龙》是“杂文学”的理论著作，并非“中国古代文章学”的著作。宋代文章总集把六朝以来一直被排斥在集部之外的先秦汉代的经、子、史的大量内容吸纳到文章系统之中，大大扩展了“文章”的内容。“中国文章学体系是在礼乐制度、政治制度的基础之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并始终与礼乐制度、政治制度密切关联，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稳定性”。

精深学理和思辨逻辑，用逻辑之“技”来载学理之“道”，虽然文辞古奥，却有理有据有力，无论是论政还是治学，其文章都卓然有力。因而任鸿隽直接拿来主义，强调“学”给文学注入理性，“吾国不但学不如人，即文亦每下愈况，以所重者徒在文字而无实质以副之故也。”^[19]强调学术有助于增强文质。这一主张的文学观念与中国古代学者散文理念相一致。但是到了近代，“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末，西方以现代审美主体的美学来规划文学的思潮已经波及东方，它主要是通过经由日本人翻译的西方文学史著作而影响汉语文化界的。”^{[8]66}文学的审美特质出现了现代性的转变，因而以西方思潮影响下的文学逐渐形成了文学主流，审美作为文学主体特质，成为区别其他文化的特征。文学独立发展的规定性越来越强化。任鸿隽和章太炎的文学观就散落在文学视野的外围^{[8]69⑥}。

2.2 建立国文崇实贵确的表意能力

任鸿隽提出用文学承载科学，从而将科学移植进中国文化，显然初到美国的任鸿隽离不开其根深蒂固的学术思想——章太炎古文经学的方法，即“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20]章太炎围绕“小学”，从字源考据入手，重视证据，遵守法度，以理性的精神从事治学撰文，已经具备了科学研究的精神和方法。因而当任鸿隽将章太炎古文经学的方法拿来致力西学传播，并没有发生两种文化因为质的不同而相互龃龉的情况。相反，任鸿隽以此

为参照而进行的科学教育理念传播恰恰符合了章太炎“知文”^{[21]⑦}的要求。但是任鸿隽的文学精神又与章太炎明显不同。章太炎试图“以文字为准”重新确立文学现代表意功能，使文章能切中时弊，引起思想上的辩难。而任鸿隽则更看重文学能够达到科学的求知高度，抑或说文字要准确表达科学内涵。科学将不再是削足适履进入文学，相反是积极重铸文学的形体来与科学的灵魂形成一致。因而，任鸿隽的文学观是章太炎文学观在自然科学向度的一次深化。古文经学只是任鸿隽文化潜意识中依赖的方法，然而却是积极帮助他逐渐廓清了自然科学的面貌于国人眼前。从“考据”科学汉译名词、用归纳法疏通科学“义理”传达科学真知、到明确科学语言崇实贵确的“词章”规范，做到了（将科学）“断非一枝一叶搬运回国所能为力”，否则“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均无移植之望。”^[22]



图7 1916年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年会合影（前排左五为任鸿隽）

可以说，从洋务运动将科学视作中学补充开始，中国学术和西方学术都在相互融入中做出改变，直至有了一个契机，致用的文学精神将中国文学从形而上的审美视线拉向

⑥鲁迅就曾经不满章太炎以“文字为准则”的文学观，认为文太过宽泛就少了自己的独特性。见许寿裳《从章先生学》里有相关记载。陈雪虎认为，周氏兄弟阅读大量西方现代意义的作品和受德国古典美学影响的文学理论之后，对文学审美的独特品性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认识，在新文学运动中成为主流文学思想。章太炎的文学观遭到世人日渐冷淡，因而任鸿隽的文学观也就不可能进入文学史视野。

⑦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论式》中说，“文生于名，名生于形，形之所限者分，分之所稽者理。分理明察，谓之知文。”

形而下的现实关怀，而自然科学也已经让国人认识到其本质是器物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结合。在章太炎和任鸿隽这对师生的努力下，中国学术和西方自然科学学术终于有了握手言欢的可能。他们还在将科学文章纳入文学的旗帜下之时，不仅让国人倍感科学亲切，也让中国传统文章学走入新的应用领域，愈加与 20 世纪中国轰轰烈烈发生的现代文学观念渐行渐远，最终成为现代论说文范畴，而与“文学”脱离开母体。

2.2.1 “考据”：审定科学名词，用“小学”打开将自然科学引入中文世界的大门

审定科学名词是《科学》杂志的要务之一。任鸿隽力主“足为科学定名之豫备者，其唯《科学》杂志乎。”^[23]他带头参与名词审定，撰写《化学元素命名说》，可以窥见他用国文考据治学的方式和态度。

任鸿隽指出新元素名称没有对应中文翻译的问题，“荀卿有言：‘有王者起，比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化学上诸新元素，当未发现以前，不唯我无此名，即世界上无此名。既发现以后，彼有此名矣，而我犹无此名，如实者其名为新”^[24]。章太炎在《诂书·订文》中提到过类似的问题，“故无其名，今匱于用者，则自我作之。”章太炎举了一个例子，把语言按照“通俗之言”“科学之言”^[25]⁴⁰²分成两类，比如碳、铅、金刚石，这是通俗叫法，作为同素异形体，他们在科学上有一个共同的名称“炭”。通俗与科学之言不同，因而为了各自表达的需要，都有出现“新字词的必要”。“然苟无新造之字，则器用之新增者，其名必彼此相借矣。”“则当特造矣”。曾经研读过《诂书》的任鸿隽不能不记得《订文》所论述的造字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在将科学外来词和汉语翻译进行对照的时候，他发现翻译汉语本没有的事物，则很容易出现问题。比如 HCl 和 NaCl，日语译过来叫盐酸和盐化物，我们用在

汉语里，其实并不是很准确，盐会让中国人误与食盐混淆，因而从字源上来恢复 Chlorine 的原意，原意是指绿色，“吾人旧以‘绿’名此元素（Cl）。”所以应该把 HCl 和 NaCl 称为绿酸和绿化物更科学。从字源来对西文学术词语进行翻译可见是一种类似于训诂的考虑，更符合字源、字义、文化指代合一性这一要求。这与章太炎在《文学总略》中所提出的“凡此皆从其质为名，所以别文字于语言也”精神高度一致。力求让文字实现与所代表的“质”绝对统一，而不是靠单纯的言语来模拟和类比。古文经学至此在任鸿隽手上成为将自然科学引入中文的合法化途径。

有了统一的学术名词来表达学理，那么学理才会有指导意义，“则同人肆陈学理之应用，以为有志实业者导其先河，当非无事书空之类矣。”^[23]词汇与致用联系起来，词汇的表意功能得到空前强化。科学名词覆盖至各个学科，《〈说文〉植物古名今证》（胡先骕）、《中西星名考》（赵元任）、《化学元素命名说》（任鸿隽）等论文“涉及学科有逻辑学、心理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照相术、气象学、工学、生物学、农学及森林学、医学、人名、学社及公司名、地名等。”^[26]并且在 20 世纪 20 年代随着商务印书馆大量刊印科学丛书和科学教材，科学概念进入到教科书中，大量名词沿用至今。

此外大量有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词汇，诸如“理性派”“实验派”“归纳法”“演绎法”“定量分析”“定性分析”“抽象”“具体”“效率”“内涵”“外延”“理性”“推理”“判断”等词汇大量使用，这些词汇逐渐被赋予更多的社会学意义，在营造崇尚科学的社会风气，抵制落后愚昧的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2.2 “义理”：强调科学方法对文学的建设作用，确立通过文学抵达科学认知的高度

任鸿隽将科学方法确立为治学行文之法，

由此开启现代文章学的规范。在《建立学界再论》中任鸿隽说,“近世中国舍文人外无所谓学者也”,没有学者意味着当时的文人不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储备,“是故欲立学界,在进文人知识,欲进知识,在明科学,明科学,在得所以为学之术,为学之术,在由归纳的理论法入手,不以寻章摘句玩索故纸为已足。”那么文人具备知识成为学者,则学者之文就可以通向致用。那么学者之文该如何体现科学方法和精神?

任鸿隽在《科学与教育》一文中给出了答案。文章要符合两个条件:一遵循文法,保证逻辑思维的连贯和顺畅。他强调文法在西方属于科学研究范畴,突出文法和思维的关系,“吾人则谓其为文词字不中律令者,其人心必无条理。故文法之不可不讲,亦正以其为思理训练上之一事耳。”二能承载文意,将科学方法归纳法引入文章方法,用一般事实到普遍规律的结构来撰写文章,“然吾人当知文字之有关于人生者,必自观察实际,抽绎现象而得之,而非钻研故纸,与玩弄词章所能为功”。如果说强调文法是自《马氏文通》以来,西方语言影响下语言侧重表意的呈现,一以贯之到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都在强调,并不算是任鸿隽原创的理念。但是将归纳法作为文章方法、注重理性的推导和陈述,则可以说是任鸿隽对文章学发展的一种新见解、新手段和新贡献,是典型的科学方法对人文意识的影响和干涉。

对于归纳法的强调,任鸿隽在《论学》中有了进一步论述,“吾国古人为学之法,言格物致知矣。”然而徒有其法,并无其术。“然理当穷矣,而穷理之法,未之闻也;知当致矣,而致知之术,未尝言也。”尽管周秦间出现了大量的学术,因为没有学术方法,导致学术不能推进和光大。因而“吾人欲补格致篇之亡,舍西方重归纳尚事实之学术,固

无以也。”学术上加强对归纳法的重视,因而学者才能彻底摆脱注重文字的窠臼,摆脱“吾国不但学不如人,即文亦每下愈况”的局面。用归纳法增进学术,增进文质,改善文风,是任鸿隽给出的文学革命的方略。

与此同时,西方文学思潮影响下的晚清文学,其独立发展的趋势正在加速前进。而任鸿隽所开启的注重文法、强调推理求证、逻辑严谨的科学认知文章则朝着现代科学论说文方向发展。中国文学的参天大树,在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段岁月,在欧风美雨的吹拂下,开始分叉生长,一枝伸向现代文学发展的天空,一枝伸向学术的天空,自此分道扬镳。任鸿隽的文学观正是历史进程中传统文学走向蜕变的历史遗留,是中文渐渐具备自然科学学术表达能力并开始萌芽发展的征兆。

2.2.3 “词章”: 强调科学尊重事实的原则, 建立重事实、轻文辞的文风

任鸿隽在《吾国学术思想之未来》梳理了中国只有文学而没有思想的情况。秦汉学者发言论事,以古义为依托,历史的文学走向繁盛。然而魏晋转向清谈,格物之意少。之后“其文学则渐趋骈俪,乃至重文词而贱思想”,唐文学复古,宋理学又推崇心理之精微,“其事盖等于太空之鸟道”,自元以后异族迭起,生灵涂炭,思想无进步。“四千年思想之历史,盖文学的而非科学的”,“一说之成,一学之立,构之于心,而未尝征之于物;任主观之观察,而未尝从客观之分析;尽人事之繁变,而未暇究物理之纷纭”^[27]。没有思想则是《论学》所说“文乃每下愈况”的原因,而思想之匮乏,又是因为学术不能以客观事物为研究对象。以客观对象为治学的出发点,是能够引起思想发展、文学发展的根源,这自然是科学训练带给任鸿隽的认识,在用力阐释方面较章太炎更为深入。章太炎思想的出发点是文字务实,以此构建文学干预社

会的能力；任鸿隽的出发点是文字务实的途径——科学方法，以此达成务实的可行方案。

但无论是任鸿隽，还是章太炎，在强调文字的准确性和义理的致用性上具有深刻的共识。“然则文辞愈工者，病亦愈剧……文辞虽以存质为本干，然业曰文矣，其不能一从质言，可知也。文益离质，则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笃。”^{[25]398}任鸿隽树立了崇实贵确的学术风格和行文风格。在审视严复的《天演论》翻译中任鸿隽亦指出了多处因为苛求言辞雅致，而放弃了文字准确的原则，以“雅”害了“信”和“达”，对于科学翻译来说这一条非常致命^[28]。从翻译这件事上已经能够看出两者文学观念的不同。任鸿隽虽然坚持自己的科学文章就是文学，这是他骨子里传统文人的潜意识，与历史上唐宋古文运动追求古朴文质有着表面的类似。历次古文运动希望通过利用文字的直观表意，达成求真务实、消弭浮泛的文风，但毕竟“著文”是他们的根本立足点，精神教化和意境审美是他们的追求。沉浸传统文学教育颇深的严复选择“雅”自然有其审美上的考虑。然而任鸿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经历了自然科学的洗礼，他强调文字准确的目的，根本上是受到科学本身的召唤。他期待用体现科学方法和科学内涵建立起来的文字表意系统，帮助国人建立理性思维。思维建设的要求远远超出了审美。因而这就是任鸿隽口口声声称之为文学的科学文章实际上并没有划归为文学的又一个原因。他撰写的大量文章，承载着“德先生”“赛先生”，驰骋在《科学》《新青年》阵地上，终究不是新文学，被冠名以“新文化”，就是这个原因。但是任鸿隽的文学观价值在于，他独特的“文学观”是传统的古文

观念和现代学术思想过度的中间环节，是科学语言、科学思维、科学意识本土化的重要途径。对于我们今天如何立足本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依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3 科学化文学观的实现路径：文人向学者转化

任鸿隽在1916年1月《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科学精神论》，呼吁知识分子必须走上实证研究的学术之路，用自然科学方法彻底改变国学研究方法，开启传统文人向现代学者转化之路。

随后，1916年5月发表的《论学》再一次重申了《科学精神论》的观点，并表达了“吾人学以明道，而西方学以求真”“西人得其为学之术，故其学繁衍滋大浸积而益宏。”“凡吾国学术之衰，文学之弊之原因具是矣”。文人必须走上西方学术之路才能彻底改变这一局面。这一论述在他和胡适的“白话文”论战中得到了加强，被胡适记录下来，成为白话文学发轫时的众声喧哗之一。

1915年、1916年这两年正是任鸿隽、梅光迪与胡适就“文言”“白话”“死文字”“活文字”打口水战不可开交之时。胡适在《尝试集》自序、《口述自传》《逼上梁山》反复提到了白话文论争的源起，《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和凯约加湖翻船等事件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白话入诗的争论，三人关于白话文学的辩难拉开了序幕，直到1916年胡适给梅光迪的信中明确写出，“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需作诗如作文。”白话入诗是破除旧文学壁垒的关键，补足自梁启超等提倡“文界革命”只革精神不革形式的弊端，即从内容到形式将文学革命进行到底^{[29]⑧}。在于“略谓今日文学

⑧胡适注重形式革命，是晚清文学革命的一种推进。夏晓虹在《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中说，“胡适真实的想法，则是在‘文学革命’的次第中，形式革命应先于并重于精神革命。这正好与梁启超注明的论断‘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相对应。显然，胡适所做的工作，是将晚清‘文学改良’已经率先开始的文学的‘精神革命’，再向前推进到‘形式革命’的层面”。

之大病，在于徒有形式而无精神，徒有文而无质。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而已。今欲救此文胜之弊，宜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避之。三者皆以质救文胜之弊也。”^[30]这与任鸿隽所看到的当时文学每况愈下的情形是一致的。然而任鸿隽与胡适的分歧点不是通过语言形式达到以质救人，“徒于文字形式上的讨论，无当也”，而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无学。救之之法，当从绩学入手。”^[31]

这一绩学当包括两方面：以实证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有实验而后有正确智识，有正确智识而后有真正学术，此固为学之正鹄也。而当吾国文弊之后，尤眩暝之药，不可一日无者也。”^[27]另一方面，打破中体西用的功利主义物质观，正视科学对价值观的影响。

任鸿隽的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是文学革命的根本手段，但却没有胡适的白话文运动更为激进和具有煽动性。并且胡适本人的多次回忆成为白话文历史起点的公认事实，任鸿隽的声音被历史遗忘。但是历史发展确实沿着任鸿隽的构想延伸。具备现代知识体系的文人在承载理性的自由度上更显强大的白话文领域中注入了现代文明。20世纪发展起来的文学或者学术，都已经无法离开自然科学的普及和传播影响。

4 任鸿隽在近现代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地位

近代以来，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维新变法，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学术的接触经历了从排斥到尝试，最终到全盘接受的过程。中国学术该以何种身份在历史演进中保留既是有关民族自信，也是有关民族发展的问题。洋务运动的全面失败让中学为体的中国学术颜面扫地，维新运动的改良决策又无法搬动强大腐朽的封建势力。文人在动用学术资源考量社会变革的同时，一方面进行思想救国，一方面思考着中国学术更新涅槃的方式。章太炎将挽救中国文学放在了学者型文人身上。他放眼中国历史，学者文人的历史脉络可以梳理为上至王充、仲长统，下至清代王夫之、顾炎武。学者文人用最踏实、严谨、刻骨的行文干预社会现实，参与社会思想革新，对社会变革产生地震般地轰动。而任鸿隽的学者行文又突破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借用章太炎近代化国学思想搭建起中西学术的桥梁，将自然科学引入中文表达。可以说章太炎一脉将中国学术集大成地推向近代发展，并且在任鸿隽手中完成彻底的全盘西化。自任鸿隽之后，学者和文人分家，学术和文学异路，国学和自然科学互无联系。这一特殊历史时刻诞生的文人学者应该引起学界足够重视，为当前国内学术和世界学术的交流互渗，中国文化的全球化发展提供思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 [1] 鲁迅.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M]// 陈平原 杜玲玲编. 追忆章太炎.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6: 47-49.
- [2] 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8: 6.
- [3] 陈衡哲. 任叔永先生不朽 [M]// 任鸿隽. 科学救国之梦.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 745-748.
- [4] 夏晓虹. 燕园学文录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110.
- [5] 任鸿隽. 五十自述 [M]// 任鸿隽. 科学救国之梦.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 675-689.
- [6] 任鸿隽. 记章太炎先生 [M]// 陈平原 杜玲玲编. 追忆章太炎.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6: 266-270.
- [7] 章太炎. 变法箴言 [N]. 经世报 创刊号, 1897.

(下转第103页)

- [1] 胡宣明. 中华教育卫生联合会小丛书之六: 家庭卫生 [M]. 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18: 1.
- [2] 黄周年. 人人必备: 家庭卫生大全 [M]. 上海: 上海卫生研究社, 1935.
- [3] 王世伟, 陈志潜. 初中学生文库: 家庭卫生 [M]. 上海: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1936.
- [4] 保婴事务所. 主妇须知: 家庭卫生及家政概要 [M]. 第二版. 全国卫生试验处: 内政部卫生署, 1934.
- [5] 汤汉志, 叶维法. 国民文库: 家庭卫生 [M]. 沪三版. 上海: 中国文化服务社, 1946.
- [6] 费仁. 饮食之卫生 [J]. 现代家庭, 1940, 4(4): 34.
- [7] 迪互. 屋房的设置和卫生 [J]. 家庭星期, 1936, 1(20): 10.
- [8] 王世伟. 家庭卫生之概要 [J]. 卫生月刊, 1935, 5(9): 20-25.
- [9] 郁佩英. 卫生常识—口腔卫生法 [J]. 家庭医药常识, 1936(14): 18-19.
- [10] 丕显. 家庭卫生常识—如何扑灭肺结核 [J]. 家庭周刊, 1935, 乙种 (96): 41-43.
- [11] 尤怀皋. 家政学讲座 (续) 一个人卫生篇 [J]. 家庭星期, 1935, 1(3): 11.
- [12] 仁达. 穿高跟鞋之不卫生 [J]. 家庭周刊, 1936, 乙种 (114): 32-33.
- [13] 陆瑞英. 妊期卫生 [J]. 家庭星期, 1937, 2(11): 170.
- [14] 梅馥, 蒋文泉. 医药卫生专辑—白喉的预防—新时代父母对子女责任之一 [J]. 健康家庭, 1939(4): 39-40.
- [15] 卓然. 怎样注意口腔卫生 [J]. 家庭星期, 1936, 1(13): 10-11.
- [16] 罗芙芸. 卫生的现代性: 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余疾病的含义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240.
- [17] 卫生警察 [M]. 福州: 福建省民众教育师资训练所, 1923: 8-9.

(上接第 94 页)

- [8] 陈雪虎. “文”的再认: 章太炎文论初探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9] 张昭军. 儒学近代之境——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2002: 61.
- [10] 任鸿隽. 前尘琐记 [M]// 任鸿隽. 科学救国之梦.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 690-715.
- [11] 许寿裳. 从章先生学 [M]// 陈平原 杜玲玲编. 追忆章太炎.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 259-262.
- [12] 周作人. 民报社听讲 [M]// 陈平原 杜玲玲编. 追忆章太炎.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 263-265.
- [13] 任鸿隽. 建立学界论 [M]// 任鸿隽. 科学救国之梦.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 3-9.
- [14] 章太炎. 国学讲习会序 [N] 民报. 第 7 号.
- [15] 任鸿隽. 建立学界再论 [M]// 任鸿隽. 科学救国之梦.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 10-13.
- [16] 任鸿隽. 科学与教育 [M]// 任鸿隽. 科学救国之梦.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 61-67.
- [17] 吴承学. 中国文章学成立与古文之学的兴起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12): 138-156.
- [18] 章太炎. 国故论衡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84.
- [19] 任鸿隽. 论学 [M]// 任鸿隽. 科学救国之梦.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 84-87.
- [20] 章太炎. 章太炎全集 (四)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119.
- [21] 章太炎. 国故论衡疏证 [M]. 庞俊, 郭诚永, 疏证.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398.
- [22] 任鸿隽. 在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年会上的开幕辞 [M]// 任鸿隽. 科学救国之梦.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 88-89.
- [23] 任鸿隽. 解惑 [M]// 任鸿隽. 科学救国之梦.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 39-42.
- [24] 任鸿隽. 化学元素命名说 [M]// 任鸿隽. 科学救国之梦.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 24-31.
- [25] 章太炎. 廛书详注 [M]. 徐复, 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402.
- [26] 樊洪业. 《科学》杂志与中国科学社史事汇要 (1914—1918) [J]. 科学, 2005(1): 37-40.
- [27] 任鸿隽. 吾国学术思想之未来 [M]// 任鸿隽. 科学救国之梦.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 112-117.
- [28] 任鸿隽. 谈科学翻译问题——从严译《天演论》说起 [M]// 任鸿隽. 科学救国之梦.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 666-672.
- [29] 夏晓虹. 梁启超: 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 111.
- [30] 胡适. 胡适留学日记 [M].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12: 485.
- [31] 胡适. 逼上梁山 [M]// 胡适. 新生活.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 58-88.

103

A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r Science Tourism Products of Guilin Karst World Natural Heritage Site: Based on RMP Analysis

Chen Wei

(College of Tourism and Culture,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1)

Abstract: Guilin, as an international tourist resort, has boasted abundant Karst natural resources with high tourism development value. This paper, taking the Karst world natural heritage site of Guilin as the research target under the guidance of RMP theory,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eco-tourism resources, the tourism market and the related tourism products. Subsequent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ecological subjects including the leisure ecolog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xperiencing ecological science tourism, and the special ecological science tourism. The purpose i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developing and innovating ecological science tourism in Guilin.

Keywords: RMP theory; Karst world natural heritage; ecological science tourism; product development

CLC Numbers: F590.3 **Document Code:** A **DOI:** 10.19293/j.cnki.1673-8357.2019.02.011

On Modern Literature View and Science Communication: Ren Hongjun's Literature Idea of Sav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Geng Xian¹ Tian Liepeng²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Beijing 100012) ¹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²

Abstract: Zhang Taiyan, whose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s was based on “Xiao xue—a reading of ancient classics prior to Qin dynasty”, advoc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literature thought of “taking characters as the criterion”, stressed the functioning role of ideographic expression of characters and its application, and tried to achieve the utmost effect of meticulous reasoning by invoking extensive arguments from Chinese and Western learnings. In his early years, Ren Hongjun, inspired by Zhang Taiyan’s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classics, always adhered to his standpoint for Chinese learning on the road of saving country by science, insisted that scientific articles were also literature, and strived to reshape the Chinese people’s outlook on life with a scientific literature outlook. Meanwhile, he examined the attitude of scientific literature view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righteousness from confucious classics, textual criticism and Ci zhang—poetry and literature”, establishing the idea of

cherishing reality and preciseness for Chinese literature. Ren's "literature view" was a sign of an overall westernization of Chinese learning. His view reflected a separation of literature from modern academic learning and the path of the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and modern scholars.

Keywords: ancient classics; scientific literature view; new culture movement; literature revolution; natural science

CLC Numbers: G206 **Document Code:** A **DOI:** 10.19293/j.cnki.1673-8357.2019.02.012

On Popularization of Home Sanitation Concept and Knowled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Study on the Related Print Media Especially during the New Life Movement

Ma Yanyang Zhang Meifang Wang Yaohua

(Institute for Cultural Heritage and Histor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of Beijing,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Through an investigation of relevant books and popular newspapers, the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dissemin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home sanitation concept and knowledge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especially during the New Life Movement. It found that the main disseminators are doctors with western medical background; The relevant guidances about home sanitation are mostly based on bacteriology, physiological anatomy, microbiology and nutrition, etc; The aim of such spreading is to make people's family life more scientific, and eventually to realize prosperity and modernization for the country.

Keywords: home sanitation; dissemin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the New Life Movement

CLC Numbers: G206 **Document Code:** A **DOI:** 10.19293/j.cnki.1673-8357.2019.02.013